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rmy during the All-out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A Survey Centered on the Taihang Base Area

Ruifeng Li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a,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lrfmaster@163.com

Qianhou Yue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Republican China and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yueqh@126.com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共党军关系——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李瑞峰

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

岳谦厚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Abstract. “The Party leads the army,” “the Party controls the army,” and “the Party commands the gun” are 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of the army, which emphasize that the army must follow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arry out the political tasks set by the Party, and defend the key interests of the Part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ll-out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Eighth Route Army, under the Party’s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ed toward the Taihang mountains. The army helped the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there to recover and develop, while the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helped the army to fight and to enlarge its forces.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army together established the basis of the political-military configuration of the Taihang Base Area and put into effect the strategic intentions of the Party. When the Base Area entered into the consolidation-and-development stage 发展巩固阶段, however, signs of discoordination emerged. In this speci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rther ironed out the Party-army relationship by organization-building (for both Party central and local and military branches) and fighting against Guomintang reactionaries and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their puppet government. Particularly, the Party continued political training for the army to make sure that it remained under the absolut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By uniting the army and the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to implement the political lines and concrete policies of the Party central, a unified configuration of leadership in the Taihang Base Area was established, the Party,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all united as a whol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arned tremendous support for the war against Japan. This process involved at onc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arty central and the army 中央与军队, between the military Party branches and the army 军队党与军队, and between the local Party branches and the army 地方党与军队, and it was an arduous journey rather than an easy walk.

Keywords: the Overall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Eighth Route

Army; the Taihang base area; the Party-army relationship

摘要：“以党领军”“以党统军”“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的政治原则和制度设计，即军队必须服从于党的领导意志、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维护党的核心利益。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在中共中央战略指导下，八路军挺进太行山区，助力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地方党则协助军队作战与扩大武装，两者相互配合，奠定了太行根据地创建的政治军事组织基础，实现了中央战略意图的落地生根。根据地进入巩固与发展时期，军队内部及军队与地方党之间出现些许消极现象。在特殊政治环境下，为确保抗战事业顺畅，中共以对党组织（含中央党、地方党、军队党）的建设及与国民党顽固派、日伪敌对势力的斗争，进一步理顺了党军关系。其中，不断强化的军队政治工作以持续发力的政治训练，保障了党（中央及军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同时，军队与地方党团结协力贯彻中央路线与政策，太行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本组织架构得以确立，党政军民同心同力结为一体，中共由此获得源源不断的抗战动力支持。当然，这一过程关涉中央与军队、军队党与军队及地方党与军队三重关系维度，完成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不少繁难曲折。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太行根据地；党军关系

俄共“以党领军”的治军模式在十月革命及其后的政权稳定时期均发挥出无可替代的功效（李翔，2016：126）。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以俄为师”潮流中，对苏俄政治军事制度的选择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追求。在苏俄与中共推动下，国民党率先实践党军体制并在北伐战争中张大其效。1927年国民党“清党”之后，党军体制因国共合作破裂走向新阶段，国民党步入“以军为中心”旧途，而中共继续践行“以党领军”原则并对之加以创新性改造，衍生出特色鲜明的党军关系，即“军队必须完全地绝对地无条件地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塑造了苏维埃革命的新面相（军事科学院《谭政军事文选》编辑组，2000：200）。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毛泽东更明确提出“党指挥枪”的论断，进一步夯实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学界先前关于中共党军关系研究多注重苏维埃革命时期，而缺乏对全面抗战时期深入细致的考察。^①事实上，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状况复杂，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存在着特殊的“央地”关系（李金铮，2016），党军关系亦带有中央与军队、地方党与军队及军队党与军队本身三重维度。本文所指中共党军关系，既包含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主要系中共中央）如何完善“党指挥枪”的制度，还涉及到根据地内部地方党与军队协调问题。^②太行抗日根据地处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区，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领导和坚持华北抗战的战略中枢，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奠基石”（岳谦厚，2018）。故本文以之为中心，对这一时期中共党军相互关系做进一步探讨，揭示中共在特殊时期及地域内实践“党指挥枪”原则的繁难曲折性，丰富中共党史及中国抗战史研究。

一、互助共赢：党军关系的地方模式

^① 如[日]田中仁（2009）、何友良（2017）、李月军（2013）、曹子洋（2017）等。

^② 有论者指出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军地关系”。参见任伟（2018）。但笔者认为抗战期间中共党政难分，从更宽泛层面上讲仍可归于地方层面的“党军关系”。

南昌起义之后，中共进入领导武装革命的新时期，中国工农红军采用苏俄党军制度，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以党领军”成为中共领导军队的原则（中央档案馆，1989：491）。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军队之关系，即“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1a：727）可知党领导军队、军队助力党组织建立是党军关系的题中之义。这一政策在全面抗战时期得到发展。“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并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配合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抵抗日军的强大进攻。基于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判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将在华北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建游击根据地作为八路军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16-17）。其中，创建地方党^①是一项基础性任务。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明确要求，部队在地方上应“协助地方党部发展与加强党的组织及领导，无党的地方，部队应负起建立的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89）随着战局发展，为达到支持山西正面战场的目标，八路军的部署至为重要。1937年9月1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任弼时，要求“以一二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30）。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命令，决定以山西为战略支点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分兵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9月21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合发出训令：“一二九师到达正太路以南，在辽县（今左权县）设后方机关，掩护并开展太行山脉之群众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38）11月4日，八路军总部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师应抽出大批干部，组织强有力的工作团并各师随校，分成若干队组……进行扩红、组织游击队，改善人民生活，建立党，创立根据地等群众地方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95）据此，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由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执行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太原沦陷之后，国民党军队溃败如潮，地方官员逃之殆尽，“社会秩序极度震荡，群众大部分动摇暗淡，无所适从……”（山西省档案馆，1989a：289）这种权力真空和混乱局面为中共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毛泽东即指示“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97-98）。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方针，1937年11月中旬一二九师师部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会议，传达八路军总部决定，具体研究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工作。石拐会议后，八路军一二九师陆续派遣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等人率领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分别到晋东南各地协助地方党和牺盟会开展工作。分散到各地的八路军，或以“八路军工作团”名义，

^① 本文所述“地方党”多见于中共方面的各类文件，系指中共地方党组织，包括省、市、县及以下组织，在太行区则为中共太行区党委（中共冀豫晋省委）及其附属县级以上组织。

或以支队大队等名义，在各地从事建党建政、组织游击队活动。如1937年10月下旬八路军教导团团团长翁可业抵达和顺后，即负责组建中共和顺工委，不久改称中共和顺县委，和顺县有了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山西省和顺县委组织部等，1995：13）。11月15日，在八路军工作团团团长傅竹庭帮助下，中共襄垣县工委成立，由此推动了该县党组织恢复，先后建立6个党支部、12个党小组（中共山西省襄垣县委组织部等，1992：21-22）。在辽县，11月八路军到达后“形势大变”，其宣传队成为当地建党主力（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89：572）。1938年之前许多“村是没有党的组织的，从我党军到达此地以后，各地方的组织，在党军的党帮助之下，纷纷建立了。”^①同时，八路军总部训令“各级政治机关应在驻地负责帮助地方党训练党员，基干部队办短期的党员、支委等训练班。”（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191）一二九师随即协助地方党开办训练班培养干部。如12月中共沁源县委恢复后即以八路军工作团名义对外活动（中共山西省沁源县委组织部等，1992：26）。

在冀西，1937年11月一二九师派出骑兵团挺进赞皇、临城等地，协助冀西民训处组织游击队，帮助恢复建立当地党组织。1938年2月10日，又派出张贤约、张南生率领先遣支队在冀豫地区活动，并协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在豫北，一二九师先后派遣纪德贵支队和三八六旅南下进驻林县，配合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在八路军襄助下，晋冀豫地区党组织得到恢复发展，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到1938年5月，晋冀豫根据地党组织初具规模，中共冀豫晋省委先后建立起6个特委和1个办事处，至7月下属70个县党组织，党员发展到8600名左右，为坚持华北长期抗战创造了组织条件（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993：559）。6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召开工作会议，通过《新形势下省委工作新任务》的决定。8月，中共冀豫晋省委改称晋冀豫区委，辖晋中、冀晋、冀豫、太行、太岳、晋豫等特委，全面担负起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建设任务。

作为中共中央在地方意志的化身，地方党肩负着贯彻中央政策的使命，对“党军”的支持与配合则自然成为其组织任务。根据地初创时期，八路军能否壮大事关党的抗战事业。对此，中共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八路军，是发展进步势力之骨干的中心一环，是拳头。”（山西省档案馆，1994a：200）1937年11月，随着太原沦陷，华北抗战逐渐进入以游击战为中心的新阶段，扩大八路军刻不容缓。同月17日，刘少奇、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199）。12月9日，彭真进一步要求“各级党部，必须立即集中力量有计划地大刀阔斧地扩大红军并广泛建立游击队。”（山西省档案馆，1989a：70）八路军总部则对具体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党、军双方协议划分工作地区、分配数目，按各区的具体情形规定扩兵方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474）。扩大八路军业已成为军队党和地方党的共同责任。中共晋冀豫省委号召各级党组织“迅速猛烈地扩大八路军，拥护八路军。全党同志动员起来，进行扩红运动。”（山

^①《晋冀豫区左权支部工作调查材料》（1942年2月2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1-2-36-4。

西省档案馆，1989a：37）乃至直接要求各级党将爱护军队作为自觉意识，“在每个地方党支部中进行深入的爱护党军的教育，要大大发扬党员参加党军的光荣。”^①据此，太行山区各县掀起扩军热潮。如在和顺除一二九师、特委、县委建立武装外，几乎所有区及大编村都拥有自己的武装，这些武装随后大都集体加入八路军。和顺县委在全县开展“借粮”“借钱”运动，为部队筹集给养。1938、1939年领导开展的扩军运动又为八路军“秦赖支队”补充了大量兵员，使之由创建初期的数百人发展到1939年的5000多人（中共山西省和顺县委组织部等，1995：14-15）。

不仅如此，积极配合八路军作战亦是地方党组织的基本职责。1938年12月，日军以6个大队兵力分六路向根据地进攻，地方党组织民众支援军队作战，“在粉碎敌人六路围攻中起了相当作用”（山西省档案馆，1989a：502）。1939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晋冀豫根据地，中共晋冀豫区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县“全党力量应立即发动、组织与配合八路军动员群众参战，用绝大力量动员新战士，扩大八路军、游击队，帮助粮食给养，发动群众慰劳粮食、鞋、袜、手巾等必需品，解决部队各种困难。”（山西省档案馆，1989b：419）7月，日军对晋冀豫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在给各部队训令中强调“战斗中地方党密切联系，积极帮助地方工作，使工作深入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359）晋冀豫区委在扩兵工作方面进行了充分动员，由县委召集分委会深入解释动员武装工作，以克服忽视扩兵工作现象；分委则召集积极分子会进行深入教育，指明参加八路军、扩大八路军是每个党员的责任，只有扩大部队才能保卫支部。正是在“党内把扩兵工作都当成了经常工作，天天作，夜夜作”，扩兵工作取得不小成绩。如7月份仅陵川一县就扩兵200多人（山西省档案馆，1989b：560）。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此基础上将地方在战时协助军队作为固定要求，“地方党应领导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以村为单位组织战时联合办事处，主要责任即应协助军队进行战时各项工作。”^②

地方党与军队相互配合的最大军事行动是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为配合八路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以迫切任务和中心工作来要求各级党委，“动员沿线的地方武装组织以及广大群众……参加与配合我正规军的作战，展开群众的破路运动。”强调“注意与军队的密切配合，听取军事方面的意见，齐一步骤，开展工作。”（山西省档案馆，1994a：596-597）在地方党政和群众密切配合下，百团大战打破日军“囚笼政策”，提高了中共和八路军威望，坚持了华北持久抗战局面。

“没有武装便不能生存，便不能坚持根据地的建设。”（山西省档案馆，1994b：62）八路军一二九师遵照中共中央指令，武装开辟太行山根据地，地方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壮大，为根据地发展创造了组织基础；地方各级党组织相继建立并领导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政权则使八路军不断扩容壮大，成为民族解放的支撑力量。“这一时期……本师力量发展了五倍，晋东南、冀南抗日根据地创立起来了，并且打下了

^① 《关于加紧冬季扩兵准备工作的指示》（7月27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11-1-4-4。

^② 《晋冀豫区党委转发北方局关于地方协助军队进行反扫荡的四项规定的通知》（1942年6月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1-8-8-9。

相当的基础，党政民的力量也在部队党的协助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时间不详 a：292）对于党军互助，彭德怀表述得很清楚，“军队中政治工作要教育军队爱护人民，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地方党也要教育、领导群众爱护军队，这是我党一个任务的两面。”（山西省档案馆，2000b：138-139）太行根据地军队和地方党团结合作，地方党协助八路军扩大武装力量，八路军帮助地方党发展党组织，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对于中共这样的发展态势，国民党方面有报告称：“中共军事力量，并不强大。所可顾虑者，厥为其党政势力之继续发展……可助其到处造成军事力量。”^①

二、行途曲折：党军关系的现实困境

太行山区地理封闭、经济落后，“一般农民的特点：保守性，私有观念很深刻，依赖性，生活散漫，没有团结，报复性，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山西省档案馆，1989a：145）这种情形势必对主要以农民为党员和兵员来源的中共党军组织形成冲击，即“党内文盲多（作半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山西省档案馆，1994b：619）。在军队方面，根据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报告，“党的工作削弱，加以部队分散，环境复杂，外界的坏影响腐蚀，我军已发生了许多极严重的现象。尤其是贪污腐化、违犯军纪、侵犯群众利益、甚至违犯国法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426）事实上，从红军改编之初，中共就预见到党军关系将受到新挑战，彭德怀分析了可能影响党对军队领导的因素：“一对新的环境还不善于对付。二无产阶级成分薄弱，干部中农民成分占大多数，在部队实际工作中常感觉锐敏不够。三党内基本教育不够。”（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7）抗战时期中共党军关系发展中遭遇的困境印证了中共先前判断。简言之，在中央层面，党对军队领导地位受到某些内外因素挑战；在根据地层面，军队与地方党关系并不融洽。

（一）党军关系面临的挑战

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后，在打击日军、动员武装民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创建根据地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因受政治、战争等内外因素影响，军队中出现一些不利党的领导情形。红军改编之初，毛泽东就注意到“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毛泽东，1991b：392-393）。从太行根据地看，由于军队不断扩大，“新老战士的成分亦随着起了变化”，人才缺乏使得政治工作乏力、部队巩固不足，“军区政治部开初成立，工作人员的缺乏，来历成分亦较复杂，兼之部队是由零散游击队集中建制之地方军，各种政治工作基础薄弱，甚至连营政工干部不是党员。”（山西省档案馆，1994a：10）同时，由于部队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加之政治工作无力，产生了军阀主义倾向，“和地方党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表现着不协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时间不详 a：290）。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军队不巩固和军队党与地方党团结不力

^①《参谋总长何应钦等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预测中共今后动向拟具应付意见》（1941年4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70006-00005-003。

两个方面。

1. 军队不巩固

八路军在敌后从事游击战，“农民是八路军的主要成分，同时也是干部的主要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1：14）而在统一战线环境中部队又被带入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政治工作不可避免地沾染到一些游击习气和军阀作风。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矫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毛泽东，1991c：934）一二九师的工作报告亦指出：“游击主义与流氓习气正在生长，特别在连排干部中表现的更严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时间不详 a：293）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亦相当普遍，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坦承，“在我们部队里三风不正的现象是存在的，特别是‘老子天下第一’，宗派主义的思想更为明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817）此外，总政治部还指出政治工作中“存在着对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不求甚解，粗枝大叶，生硬搬运，不具体化的现象。”（中央档案馆，1991c：447-448）而“最显著的是官脱离了兵，内部涣散，不团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1c：75-76）这些不良现象显然影响到军队政治工作开展。如新 10 旅是抗战初期新组建的一支部队，由于在晋冀豫长期分散游击作战，组织上松懈散漫，各种制度多不健全，形成混乱的不正规的游击主义习气，战斗力大受影响（山西省档案馆，1994b：575）。又如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特务团发生 5 个营级干部贪污腐化，以及第一营全营被贪污腐化分子贿赂蒙蔽瞒上不瞒下事件（《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9：187）。到抗战后期，这种情况仍不同程度存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 1944 年的指示提到，“政治工作在某些部队中竟然大大的削弱了，政治机关的威信降低了，某些政治工作制度也废弛了，政治工作的活动减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968-969）

“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1b：484）部队中出现军阀主义与忽视政治工作倾向，“已有的部队不坚强、不巩固，党与政治工作没有足够的健全建立”（山西省档案馆，1989a：456-457），以致“贪污、腐化、浪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某些干部逃亡、军事政治纪律的松懈”现象屡见不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139）。如八路军独立支队尽管发展迅速，但党政工作并未抓紧，“二大队出现一改编就散的现象，还发生了最严重的贪污、腐化、浪漫、军阀土匪主义等不良倾向，甚至营、连级干部不断地逃跑。三大队整排的开小差，存在严重的组织逃跑现象，甚至大批党员逃跑，政治有右倾的色彩，把握不住正确的路线。”（山西省档案馆，1989a：486-487）时任该支队司令员秦基伟在日记中写道：“部队仍然存在的严重现象是逃亡，干部不团结的现象仍然存在。”（秦基伟，2013：7-8）一年多之后的日记又载：“对二大队工作一般已有概念，其中最感觉严重的就是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打骂行为和个别干部中不团结等现象，同时部队逃亡仍然存在而甚

严重。”（秦基伟，2013：32）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在总结1940年军队工作时亦指出，“巩固部队的工作太差，发生了阚兴学、高恒如的可耻叛变，某些部队的进步不够，干部关心战士不够。”（山西省档案馆，1994a：855）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在太行军区本年度工作报告中则明确指出营兵数量与质量之差问题，具体表现在：①党政工作非常薄弱，发生某些游击队叛变。如祁县和安阳两县游击队叛变、沙河独立营教导员投敌等；②不尊重地方党的政治领导，不懂得抗日根据地各种政策，特别“去年上半年还严重存在着把敌占区当成‘殖民地’的破坏政策的行为”；③与群众关系不密切，群众纪律很严重；④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地存在，武安特务大队×中队长甚至扣留战士菜金不发而私自贩卖纸烟做生意（山西省档案馆，1994b：67）。

同时，相较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八路军军事劣势十分明显。日军的强大扫荡对八路军往往造成巨大军事压力，这在相当程度上又引起部分士兵的情绪变化。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指出：“当敌人用大力进攻的时候，可能招致较大的牺牲；也有可能遭受意外的困难，使战士们感到各种不同的刺激，引起情绪上的变化。”（军事科学院《谭政军事文选》编辑组，2006：79）秦基伟亦谈道，“……部队粮食确实不够，战士中一般情绪不好，四月份逃亡数较以往多，干部办法少，未从积极方式去克服，而是在困难面前表示低头。”（秦基伟，2013：140）

2. 军队党与地方党团结乏力

中共向来注重全党的团结统一。八路军挺进太行山区为地方党恢复发展创造了契机，但在敌后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根据地军队党与地方党之间难免发生某些协作不畅乃至不团结现象。正如中共文件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我们全党全军在政治上是完全团结的，但在个别问题上，个别部队间，个别的地方党与军队党之间，个别的干部之间已有不团结的现象发生出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9：188）刘伯承亦谈道：“我们内部，还存在有山头主义，缺乏全面观念，团结不够，互相磨擦、埋怨，影响到工作步调，不能一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1a：242）

第一，在武装政策方面，敌后频仍的战斗环境决定了扩大主力部队与发展游击队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必然选项，但在武装发展和政策制定上军队与地方党存在不同意见甚至严重分歧。如“在武装政策上……犯了一些原则上的错误，就是对地方武装的并吞主义与放任主义。”（山西省档案馆，1994b：261-262）军队对群众性游击战争问题了解不够，缺乏长远打算，只顾扩大主力部队，对地方武装培养极差，尤其忽视民兵自卫队建设，甚至将建立的地方武装“连根拔”。一二九师司令部就此指出：“（正规军）不管他们的党政工作、军事训练与供给问题，甚至有正规军、地方兵团虐待游击队，克扣其经费、衣物以为他用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629）这则使得地方武装建设羸弱，群众武装领袖培养困难，地方党工作缺乏武力支持，继之对军队产生不满。地方党因保守主义观念存在，以为党有游击队就够了而不需要什么再提高，至于游击队党政工作、作战训练、供给卫生则放任不管。地方党亦不重视正

规军补充扩大，正规军不得不分散打游击，兵员补充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和军队表现不团结，其中心问题就在于此。”（山西省档案馆，1994a：201）

第二，在组织关系方面，沟通不畅，力量分散。在上下级关系上，地方认为受军队欺压有许多意见未能声张，边区党委则患“软骨病”不予撑腰。在同级关系上，地方说军队不服从决议，军队说地方强调人民困难不解决实际问题（中央档案馆，1991d：198）。此外，地方党与八路军组织接触不按规定办法，存在紊乱现象。如军队“被判处死刑的逃跑了的钟熊才，居然能随便在长子找着当地党的关系，并藉以胡乱行为。”（山西省档案馆，1989a：367）军队与地方党组织配合不够或不团结现象在具体军事作战中亦有体现。如在1939年1月和辽战斗中，群众在地方党领导下参战，但没有得到军队应有帮助。群众组织了很多担架队集中在一个地方准备参战，军队却早已转移，群众等了一天无事可做，而军队在作战地点又找不到担架。群众急切希望了解战事消息，但军队政工机关漠不关心，不把敌情和战况告诉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325）。同时，针对日军对根据地发动的“蚕食”扫荡，地方党与军队对反“蚕食”斗争无统一认识。地方党与政权缺乏对敌斗争信心，不研究办法，不组织各种力量，对军队爱护和关心不够；军队干部孤立不配合，不了解不进行反“蚕食”斗争就没有根据地，不了解反“蚕食”斗争是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任务，不了解从反“蚕食”斗争中密切与群众关系和壮大部队（山西省档案馆，2000a：372）。这种情形导致两方在对敌斗争中遭受不必要损失。还有一些支部党员忽视党军，不愿意参加党军，“甚至与党军对立的严重现象”。^①当然，尽管军队党与地方党存在不团结现象，但“这不是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着很严重的不团结现象，并没有路线原则上的分歧，但彼此不融洽不愉快的现象是有的。”（山西省档案馆，2000b：133）

（二）党军关系受到挑战的原因

中共党组织根基不强及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离间破坏，是影响中共领导军队的主要因素。彭德怀指出：“一敌人政治阴谋怀柔政策之加紧。二汪精卫与吴佩孚等汉奸的活动。三资产阶级之溶共政策。四困难的增加尤其是战争频繁艰苦与经济困难。五我军之扩大，新成分之增加，部队的长期分散行动。”这些“客观条件增加外来诱惑，使政治动摇，贪污腐化，军阀土匪主义，内部不团结等现象易于发生，并且将动摇分子的堕落过程大大缩短了。”（《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9：187）彭真亦指出：“现在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威信及地位都飞跃地提高，许多投机分子都想着来党内浑水摸鱼，托派及一切企图破坏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敌人，也在用全力向我们内部钻（我们已经发现了多次），从内部来破坏腐化我们。”（山西省档案馆，1989a：76）

1. 党组织根基不强

作为领导军队的主体，中共党组织自身团结与巩固是掌控军队的关键要素。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实际

^① 太岳区党委：《为党军的补充问题给各地委的指示》（12月13号），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12-5-2-23。

上仍是一个年轻政党，无论最高层中央还是军队党及地方党都不同程度存在组织不巩固情形。刘少奇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在一些同志中还没有完全克服，并且在一些同志中，还存在着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妨害全党团结和统一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1e：379）国民党方面亦称，“细察共党内部，目前虽然没有分裂，但是他们的意识里，显然有了分歧的倾向。”^①其中最著名者为张国焘叛党出逃事件。

从太行根据地观之，无论军队党抑或地方党均“尚未能掌握住‘严格的布尔塞维克的组织路线’的方针，缺乏严格的组织生活，缺乏坚强的支部工作，缺乏必需的民主，缺乏党的和政策的的教育。”（山西省档案馆，1994a：860）具体而言，根据地开辟初期地方党组织虽得恢复，却“迄今还发展得十分不普遍或组织十分薄弱。这是党的工作中最大的缺点。”（山西省档案馆，1989a：74）党组织发展时期则又是“政策上相当混乱的时期，加以发展中某些原则上的错误，如大拉夫主义；用落后口号号召，‘参加共产党不当兵’、‘参加共产党不出负担不支差’、‘参加共产党发口粮’，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使党的成分十分复杂。”（山西省档案馆，2000b：756）如太岳区在党的发展中只重数量而忽视质的挑选，“有些地方形成拉夫诳骗招兵的现象，使落后的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造成组织上的混乱与松懈，特别表现得组织内部的不团结没有力量。”（山西省档案馆，1989a：399）

党组织发展中的无序性和随意性造成党内成分复杂、思想和组织上混乱，党组织难以巩固。时任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长的徐子荣称，“从全区看，各地组织一般地都存在着严重问题。有的地区，过去领导上错误因袭的恶果，还严重存在着，并严重地起着腐蚀作用。有的地区，党的下层组织领导成分复杂，富农、中农、流氓把持着党的领导地位，给党以很大损害。有的地区是在环境变化大混乱之后还没有恢复整顿起来。”（山西省档案馆，1994a：188）区党委组织部1940年4月关于全区党员成分的调查统计亦间接证明了其中的某些现象，即产业工人占0.77%、手工业工人占1.73%、雇工占7.2%、贫农占45.5%、中农占40.5%、富农占2.37%、知识分子占0.04%、商人占1.37%、流氓占0.5%。此外，党员对党的认识错综复杂，如将党视为会门、秘密农会，不清楚党与群众团体、共产党与国民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不知一个党员该做什么，“对党不了解与了解得非常错误”（山西省档案馆，1994a：544、549）。党组织发展粗疏且巩固不力影响其执行力，“各级各部的组织还没有成为合理的机器，还不能上推下动，各特委还不强，省委也还需要从健全下层工作中大大充实自己。”（山西省档案馆，1989a：249）晋冀豫区党委巡视报告指出，“普通县委和分委能力薄弱，并担负公开工作，负不起领导责任……”（山西省档案馆，1989b：47）

就军队方面言之，不巩固问题同样存在。朱德坦承，“我们军队是从中国旧社会旧军队中生长出来的，

^①《胡公冕呈蒋中正对于共党改变政策之认识及处置共党之意见》（1935年10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档号002-080104-00001-003。

因而不免也有少数人受到这种坏习气的传染。”（朱德，1943）八路军独立支队工作检讨亦指出，“建立与巩固党的绝对领导还不够”（山西省档案馆，1989b：335）。地方游击队更不例外。由于组建初期对党组织建设重视不够，“游击队（尤其是地方干队及非八路军直接协助之下成立的基干队）内党及政治机关、党与政治工作制度，一般还未很好建立起来。”（山西省档案馆，1989a：214）中共冀豫特委武装工作总结显示，“a. 各部队各游击队的党的组织异常薄弱（如磁县）或不健全（如先支）。b. 各部队各游击队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一般的薄弱，错误的严重的现象还不断地发生（如先支）。”（山西省档案馆，1989a：352）

显然，没有强固的党组织，党的政策执行与党的意志贯彻就会遭遇困境。如在太岳区党组织发展中，“（党员）里边存在着不纯洁的同情分子、异己分子与投机分子，不能遵守组织纪律，积极搞党的工作。”（山西省档案馆，1989b：719）这些组织缺陷往往容易催生许多不良倾向，“如私有观念，升官发财的思想，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军阀主义以及土匪主义等。”（山西省档案馆，1989a：150）

2. 国民党及日伪离间破坏

尽管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实现政治和解，但国民党并未轻易放弃对中共的政治军事打压。事实上，红军改编谈判时，国民党就有削弱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计划，要求在各师及总司令部委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并拟以复兴社干事康泽出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这些要求未被中共完全接受，仅在各师师部及总司令部派有联络参谋人员及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①而这种制度变化导致“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73）

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战前线后，国民党一方面对中共军队进行渗透，另一方面对之予以严格防范。中共清醒地预测，“各种破坏者对于我们的破坏将必然采取更多更巧妙的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11）任弼时则直接了当地指出：“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希望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当中消耗和削弱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及政府，对八路军不补充人员和武器，仅负责供给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粮食、被服的费用与必要弹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169）随着中共在敌后实行群众性游击战争并获得民众广泛支持，国民党加紧在政治上攻击中共，企图“利用共党内部派别矛盾，与思想斗争，以分化其内部力量。”并要求“彻底取消其一切‘特殊化’之行为与组织。”^②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方面即打算把握时机消灭中共军权政权，“予中共问题以彻底解决”。^③实际上，中共晋冀豫军区早前文件就已提到，“民族敌人勾结阶级敌人正在加紧向我进攻，用武装解决小部队，打

^①《蒋中正条谕何应钦第八路军及新四军未派联络参谋之师即商康泽派往》（1939年1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档号002-020300-00049-031。

^②《陈诚呈蒋中正修正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与我们对共党问题所取立场与方针及本党对于共产党应采取方针态度初稿请鉴核》（1939年7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档号002-080104-00001-006。

^③《何应钦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拟具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对中共处置之研究意见》（1943年5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70006-00005-004。

击进步力量，用暗杀阴谋，破坏、收买、引诱等的手段，实行军事的进攻与政治的进攻。”（山西省档案馆，1994a：20）如在四分区一带，国民党特务横行，“现已伸入潞城一带，而其窠窝则在长治。”（山西省档案馆，2000a：344）

日伪方面亦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进行渗透破坏。中央军委电令强调，“日寇有庞大的特务机关，长久的侦探工作的经验，对于抗日军队是不断的千方百计的进行其破坏阴谋，派遣侦探，收买人员，挑拨离间，以求从内部来瓦解抗日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211）从1941年3月起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起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其在战略上采用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方针，强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给根据地造成巨大压力，发生了诸如东纵一个营百余人及边纵正南独立营几十人叛变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时间不详 a：293）。又如1942年日军在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借离卦道挑拨共产党与群众关系、八路军与群众关系，企图以此摇动中共民心与军心，进而达到瓦解抵抗的目的。^①

三、良性运转：党军关系的同频调适

中共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红军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毛泽东，1991c：982）为此，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2月11日、6月23日连续发出两期整军训令，要求各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指令“加强部队中共产党与政治工作，巩固党的领导，提高纪律性，加强技术教育，提高部队战斗力；建立部队中的一切规章制度，克服游击主义，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尤其提高各级干部军事、政治和文化水平。”其中计划整训一二九师16个团，并协同整理冀南、晋冀豫军区等地方部队。1940年2月21日，八路军总部在此基础又发出继续整军的训令，仍然以“加强与巩固共产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为主要目标（岳思平，2017：203-204）。可见，中共基于已有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整军主要在于加强政治工作、推进党组织建设、强化军队党与地方党团结，以此调适党军关系和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

（一）强化军队政治工作

“革命军队要求军队的所有人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懂得战争的政治目的、任务以及为此目的任务的牺牲决心与热情勇气。”而“提高政治觉悟的惟一手段，就是政治工作。”（军事科学院《谭政军事文选》编辑组，2006：138）不仅如此，恢复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关系坚持华北抗战前途，“必须有优良的正规军和普遍的游击队。正规军要质量上精，这其中政治质量是主要的。”（山西省档案馆，1989b：656）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因受国民党干涉一度取消原有政治委员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在组织形式上的地位，使军队政治工作受到较大冲击。为改变这种状况，1937年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致电

^① 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太行区》（1942年），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11-1-8-4。

中共中央，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要点如次：（1）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2）估计到山西游击战争任务和方式，部队分开活动；（3）各旅单独行动时可临时派遣营党代表，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营代表或教导员指挥下进行政治工作；（4）师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导员；（5）军政委员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任，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73-74）。22日，张闻天和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请即速令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78）。按照命令，八路军各部队恢复各项制度。同日，一二九师所属团以上单位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同时恢复。从此，八路军政治工作直接继承了红军时期传统并在抗战新环境中得到发展。

根据地创建初期，八路军及游击队发展迅速，但在“老的成员因消耗减少，新的人员大量增加，而党员数量质量、干部质量随着相对减弱的情况下，在敌人、托匪、汉奸等的挑拨、引诱、收买、破坏、打击活动，以及外界各种恶劣影响的传播”情形下，“要保持我军艰苦卓绝，意志团结，坚决勇敢，高度政治警觉等优良的模范传统，这须依赖更加艰苦的政治工作和坚强的党的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139）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强调“要提高党军政治委员制度，以党为核心，作坚固的堡垒，要成为在最困难中不可克服的堡垒。”（山西省档案馆，1994a：242）在这样的认识下，中共将军队政治工作置于突出地位。

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视亦在根据地党军领导机关中得到强调。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党代表会指出：政委是党在部队中的代表，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须严厉克服轻视政治工作的单纯军事观点。要切实建立部队中政治委员制与健全各级政治机关及其工作。同时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应处处以身作则，以模范作用来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并且政治工作人员要学习军事，军事指导员要帮助政治工作（山西省档案馆，1989b：343）。八路军新10旅政委赖际发认为：首先是建立党的骨干作用，大胆吸收勇敢忠实的革命指战员入党，每伙食单位建立支部，每排建立小组，提高党员模范作用，建立党的领导。其次是健全部队各种组织及制度，党员要以身作则去遵守，反对极端民主化；加强民族意识教育，提高队员政治觉悟，克服农民保守观念、乡土观念及一切阻碍游击队进步的倾向（山西省档案馆，1989b：613）。

对此，晋冀豫军区做了大量工作，以推动部队政治工作落实。首先在军区各连建立支部。1939年初，军区连队普遍没有支部，到年底除新发展的正太、平汉两纵队个别连无支部外，基干部队均已建立，并且每排都有党小组。如八路军独立支队就采取“一切通过支部，加强政治教育，灌输民族性和阶级性的深入教育”的方式来强化党的领导（山西省档案馆，1989a：491-492）。第二，提高军队中党员比例。毛泽东强调，“无论何项性质之部队，一经编入八路军建制，必须从中建立党的组织，其指导员、教导员及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者必须是党员，并接受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993：454）军区党员

占全军人数 32%，分先支占 31.86%，直属占 46.84%，游支占 42.8%，太岳占 32.3%；各级政治人员都是党员，“没有不是党员的现象了”。第三，成立党委会。在支队、大队总支及营分支委中先后组建党委会。第四，落实政治工作机关职权。“改变以往各大队各支队的政治机关多是空架子的情况，落实具体工作，各部门工作有人负责，都能按期提出工作计划，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也增多了。”（山西省档案馆，1994a：12-13）在 1940 年工作计划中强调继续重视训练政治工作人员，营团干部由师训练，军区训练政指、支书并保证政指、支书合格；同时组织政治工作研究委员会，研究“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及“苏联政治工作条令”。（山西省档案馆，1994a：21-23）可见，军队政治工作已成为日常工作重点。

随着日军对太行根据地“扫荡”的强化，中共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更趋严峻，部队巩固任务愈艰，对政治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对此，1941 年太行军区政治工作的重点为：第一，依据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以一二九师所颁发的《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作参考，重新训练所有政治干部，使每个政治干部以至军事干部通晓政工条例精神和内容，切实贯彻执行政工条例规定。第二，加强连队、支部工作，每团创造一个到两个模范连队和模范支部，用模范去影响落后，树立连队政治工作的基础。第三，高度树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威信，反对破坏政治委员制度和轻视政治机关的任何表现。第四，进一步审查干部、培养干部，各级干部提拔须经过政治机关（班排干部须经过支部）审查（山西省档案馆，1994a：865）。至 1944 年，强化政治工作仍是中共基本政策。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要求必须强化部队政治工作，坚决反对政治工作中疲倦状态与忽视政治工作的军阀主义倾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968）。为了贯彻指示，太行军区政治部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巩固与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基础，重视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提高部队在完成每一项任务中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1986：340）。

中共亦重视游击队政治工作建设。朱德指出：“不仅要加强前方兵团的政治工作，同样要加强预备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997：156）赖若愚认为“只有积极活动和健强的党政工作，才能有效地克服农民的保守性和散漫性，使游击队逐步走上正规与升格。”（山西省档案馆，1994b：722）为做好游击队政治工作，中共冀豫晋省委要求各地方党派忠实而有能力的党员去扩大及领导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中党的组织，建立和健全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具体包括，“一发展党的组织，提高其比例到 20%-30%以上，普遍建立支部和总支部的领导。二县游击干队和各分区的基干游击队，一律设政治指导员或政治处。三切实建立部队里党的生活，经常地计划和进行党的工作。四确立党与政治机关的隶属机关。地方党只在必要时通过游击队及地方武装的政治机关指导其党的工作，纠正平行政治机关及政治委员、单独建立党的系统党的工作的错误。”（山西省档案馆，1989a：219-220）从冀豫晋省委给直南特委工作指示中则可见中共改造游击队领导的具体路径，即“武装挺进队东下的任务，首先是抓紧吉羊两部加以改造，调查登记党员，发现积极干部，组织支部，马上传达党的路线，经过他们来转变全体及整个工作，并在有

相当基础后，与邓文魁、赵二奎、刘磨头建立好友谊关系，进一步经过公开关系，派人去进行统一战线运动，并去人做政治工作；最基本的还是整理他们内部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生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猛烈地发展新党员，争取部队中党的 30%-40%的比例，特别注意淘汰那些坏的土匪流氓分子，和部队中一切腐化流氓损害群众利益的倾向做斗争，树立下党的权威，每一个同志都要作战士们的模范，这是内部的问题，这是基本的问题！”^①

对军队贯彻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八路军独立支队司令员秦基伟深有感触，“一个正确的政党和一个老百姓所拥护的军队他确能战胜当前之困难，但这里必须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和模范的领导干部，否则是不可能的。”（秦基伟，2013：32）换言之，坚强的政治工作是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获得群众拥护的必然前提之一。

（二）加强党组织建设

苏俄党军制度的特色是将严密的党组织植入军队各级系统中，以保证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组织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王奇生，2010：26）。古田会议决议将“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确立为军队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1a：736）。党组织是部队全部生活的核心力量，是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撑，政治机关始终是党的工作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11）。作为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八路军中党组织建设事关党的领导权。彭真指出“八路军之所以英勇善战，是由于党的领导和党作骨干的。”（山西省档案馆，1989a：74-75）彭德怀认为只有坚强的党组织和党的工作，武装工作才能做好，“党的组织乃是我们一本万利的资本。”（山西省档案馆，2000b：145）因此，巩固党组织、建立强大的党组织是领导军队的必须选择，“从严密党的组织开始，只有党的组织的严密，才能保证军队的巩固。”（军事科学院《谭政军事文选》编辑组，2006：161）

抗战以来党组织扩展成为应对时局的要求。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此后党组织虽迅猛发展，但党的巩固教育工作滞后。如太岳区党内文件指出，“忽视了全党的巩固与教育、组织上的整理与健全，忽视了政府、武装的领导，以及各部门的工作不能很好地配合与协作，甚而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山西省档案馆，1989b：54）基于此，1939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巩固党组织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中央档案馆，1991b：155-156）为贯彻中央指示，11月2日晋冀豫区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将在思想上政治上巩固党当作政治任务，“一党的发展一般应停止，而以紧缩、整理、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一个时期组织工作的中心任务。二为了巩固党，必须详细地慎重地审查党员成分，建立党的无产阶级骨干。三为了巩固党，必须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警觉性。四为了巩固党，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的教育。”（山西省档案馆，1989b：

^①《去把反日游击战争的烽火燃烧遍全华北——省委给直南特委暨全体同志的信》（1937年12月10日），《战斗》1937年12月25日第4期。

685-687) 指示下达后, 各地陆续开展巩固党的工作, 清理了大批不合格党员, 纯洁了组织成分。据区党委组织部调查, 1940年8月全区党员成分为“产业工人0.15%, 手工0.49%, 雇工9.7%, 贫农48.5%, 中农39.9%, 富农1.03%, 知识分子0.002%, 商人1.02%, 流氓0.02%。”(山西省档案馆, 1994a: 543) 即中、贫农占到党员绝大部分。

当然, 巩固强化军队党组织建设亦是重要方面。党员与党在军队中的“任务即是以党的路线, 保障党在军队的绝对领导, 提高军队的战斗力。”^①红军改编之初, 中共中央对党及政治机关组织进行了制度调整。为健全党的组织, 在团师以上组织党务委员会, 以进行党内组织与教育工作; 连队支部为红军党最基本的组织, 各连队支部委员会由支部大会选举5-7人组成, 不分常委, 设有书记组织宣传委员的分工(中央档案馆, 1991a: 268-269)。在太行根据地, 为严密和发展根据地武装中党的组织, 晋冀豫区委军事部决定, “一坚决保证每个战斗班排经常有三分之一的党员。二发展组织方面, 首先要注意有斗争历史的老战士大胆吸收, 坚决勇敢、工作积极、政治开展的新战士亦大量发展。主要是工农成分, 在斗争久的知识分子也应吸收。须经党委会批准, 并有候补期。”(山西省档案馆, 1989a: 377) 尽管如此, 军队中“支部工作仍是极薄弱的一环”, 八路军政治部为此要求健全支部工作, “使支部真正成为领导群众的堡垒和核心, 发展组织, 保障战斗连队中百分之四十以上党员, 以团或营为单位集中轮流训练新党员, 实现党内适当民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1994: 298-299、864)

1939年7月13日, 军委总政治部发出训令, 要求各级政治机关与党组织以巩固党和强化党的工作、加紧党内教育作为目前党的工作基本方向, 并具体要求: 第一, 以巩固工作为中心, 力求提高质量, 加强党的纪律; 第二, 积极培养党的下层基础, 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健强支部、建立领导骨干、大批培养党内积极分子上; 第三, 加紧党的阶级教育与实际生活锻炼; 第四, 培养青年队成为党在军队的外围组织、党的预备军、党的工作的有力助手; 第五, 尽力克服党内旧的宗族的地域的各种落后观念; 第六, 在新部队中加强党的工作, 充实各种政治制度, 打稳基础, 避免形式上的发展。同时纠正极端民主化倾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1994: 362)。根据指示, 晋冀豫军区就健全各级党委具体要求: “(1) 运用最民主的方式来改造各级党委, 以发扬自我批评及提高积极性, 但目前应抓紧支委会及支委会的改造工作。(2) 连队首长应每月向支部报告工作一次, 连排干部应过支部生活。”同时, 要从思想上意识上提高干部工作能力, 去提拔干部: “(1) 营以上的特别小组应成为锻炼组织观念的场所, 及保证集体领导作用。(2) 审查后的干部应重新配备一次, 特别是游击队的干部。对于游击队干部的调动须经政治机关审定及特别小组之讨论, 再交上级批准(班排干部经支部讨论)。(3) 各部队根据自己情况开办各种训练班轮番训练干部, 班级归大队, 排级归支队, 连级归军区。”为达到上述目的和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要求部

^①《康泽呈蒋中正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联络参谋李德三至六月工作报告》(1938年8月18日, 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档案, 档号002-020300-00049-020。

队中党的成分在基干队应保证 35%、游击队 30%（山西省档案馆，1994a：21-24）。在整编训练中，一二九师将党的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以进一步求得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与一致为准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时间不详 a：307）至 1942 年下半年，一二九师经过整编训练，基层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太行军区各独立营党员人数达到部队人数的 25%-30%，太岳、冀南军区各军分区凡有党员 3 人以上的单位都建立了支部或小组（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993：1382、1384）。

（三）增进军队党与地方党团结

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毛泽东，1991c：822）对党的团结要求系中共组织原则与工作原则，党团结与否关系敌后生存发展，“没有全党全军以至全区党政军民的总动员，不积极工作把所有的力量发动起来共同为着一个目标而奋斗，我们将不能迅速取得胜利。”（山西省档案馆，1989a：433）

太行根据地依靠八路军武力支持创建，巩固和发展仍离不开八路军武装卫护。正如徐子荣所言，“我们这区有党军的存在，我们的工作和一二九师党军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山西省档案馆，1989b：469、472）如根据地创建初期，为集中党军力量协力对敌，根据地建立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地方党与八路军游击队指挥，“它的主要目的是地方党与军队党联系起来”（山西省档案馆，1989a：91）。可见，对地方党与军队党团结要求是中共一贯做法。随着战局发展，中共通过明确的政策与制度来进一步推动地方党与军队党权责明确，以求军队党与地方党协作通畅，“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毛泽东，1991c：823）

第一，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地方党和军队党互相协助。作为中共中央的下级组织，地方党理所当然有着爱护与协助军队的责任。在地方党方面，帮助军队扩兵作战是主要任务，“在被割断的地方，党可与八路军或基干队连政指以上政工人员发生关系，党要用一切力量帮助部队作战，党员要领导群众帮助部队。如与部队没党的关系，可用抗日名义积极帮助部队克服困难。”（山西省档案馆，1989a：521）在军队方面，“部队要提高纪律、积极行动，纠正藉口经济困难纪律无法提高的错误观念，经常在指战员中讨论民运工作，尊重地方党，设立训练队培养军政干部。”（山西省档案馆，1989b：14）1939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联合作出关于地方党与八路军关系的决定，重点如次：（1）凡八路军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团营以上党政机关，无论到达何地均须与当地县委以上党部取得联系，积极帮助地方党的工作；（2）地方党对于八路军及其所领导下的游击队应给以各种帮助；（3）在党已有基础的地方，军队民运工作应在当地最高党部统一计划下进行；（4）各地党所创造的武装部队应有计划地动员改编为八路军，在主力到达某些地区时该地区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应统归主力指挥；（5）在指挥或在改编地方队伍时应依当地当时具体情况，与地方党部一起订出具体步骤和实施办法；（6）主力部队应注意培养与建立各地区地方性质的武装部队，以坚持该地区持久抗战；（7）在已有基干队的地区所有基干队应统归地方党领导，地

方党负责加强其军政教育，军队给以帮助，只是在配合主力作战时可临时受主力指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9：184-185）。

第二，妥善解决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分歧。由于双方关系特殊，能否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处理则关系抗战局面的稳定，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指出：处理地方党军关系“要反对军队的自高自大，干涉包办，也要反对地方同志狭隘的地方本位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749）即便如此，地方党军仍不免发生纠纷时，除“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外（毛泽东，1991c：823-824），“只可报告自己和对方的上级去解决，不得无理取闹，妨碍团结。”（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749）具体到双方团结的办法，“地委有冲突开地委会，县委则开县委会解决。”（山西省档案馆，1989b：598）换言之，在各自权责范围内解决事端，不得随意越权扩大化。当然，军队是武力集团，在地方常占据优势地位而不免看不起地方党，刘伯承就此强调“野战军派到地方部队的同志，要尊重地方党，团结地方的同志非常重要。”（山西省档案馆，1994b：132）因此，在双方有分歧时应“更多更严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论纠纷，应更多的责备军队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993：554）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必须使将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毛泽东，1991c：823-824）如关于地方武装问题上，正规军要正确领导、使用和帮助地方武装，使地方武装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在成立游击队后，部队派干部去不能一口吞走，地方部队编入正规军须得区委决定，在必要时正规军应抽出适当部队去加强游击队战斗力，在必须动员一部地方武装补充正规兵团时尤应反对“连根拔”现象（山西省档案馆，1994a：864）。

第三，统一领导党军需要配合的行动。在领导问题上，规定军分区政治部须在同级地方党领导下工作，对于各县地方党无直接关系而只有横向关系。关于地方党的一切问题须经同级地方党的机关处理（山西省档案馆，1994a：477）。194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下达后，9月1日太行分局建立，先后取消各级党政军委员会；区党委、地委、县委书记兼任同级部队（军区、军分区和县大队或独立营）政治委员或指导员。如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要求部队“了解边游武装的地方性，要与地方党亲密团结，接受地方党的领导和帮助。”（山西省档案馆，1989b：347）

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并非一蹴而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和制度安排虽在古田会议时就定型，但此后仍不断受到挑战。如红军长征期间张国焘分裂红军，“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毛泽东，1991c：185）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十二月事变”中因政治工作未能深入到下层士兵，“部队中存留了不少顽固分子一个也未清洗出去”，五区新军大部分被阎锡山拉走（山西省档案馆，1994a：82-83）。

综上所述，通过中共的政治整训，太行根据地党军关系焕然一新。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军队政治工作、强化党组织建设以及活络军队党与地方党方面全面加强了建设，干部与士兵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向党靠拢，并以党的政策和方针作为个人行动指南。如时任一二九师某部供给部指导员的田某自我反省后称“要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克服弱点”；^①干部陈某亦表示“加强自己在政治方面的修养，把握党的政治路线”是努力方向。^②正如八路军一二九师在 1941 年度工作总结中所指出的那样，“部队的团结和巩固程度增强了，指战员的关系比较过去密切，基本消灭了营以上干部和政治干部打骂人的现象，连排干部打骂人的现象也减少了，部队逃亡比去年减少一些，而且是逐月地减少着。”同时“群众纪律的较前进步，与地方党政关系更加密切了，与人民的团结加强了，人民爱护子弟兵的观念进步了。”（山西省档案馆，1994b：994）同时，地方党方面，对军队树立了共同体观念，“党与军”不可分割。如中共平顺县委一份党内文件就称：“……扩大我党军队，这对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在今天没有党军将会完蛋。”^③

结语

党是军队的灵魂，军队是党的支持力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泽东，1991b：544）换言之，“党军就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党依靠这个军队去完成政治任务，作为党遂行政治任务的工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时间不详 b：91）即军队不仅要完成战斗任务，还是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同样，地方党组织作为中共中央的下级组织，亦肩负着贯彻中共中央政策与路线的使命。可见“党军互助”实则是党军关系的题中之义。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依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挺进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地方党组织则在武力支持下迅速恢复壮大，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军队和根据地发展，初步形成地方上党军协作的局面。此即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993：421）然战时风云变幻，根据地发展及巩固阶段受国共政治军事博弈、地域环境限制及战争形势影响，中共党军关系难免遭遇暗流波折，出现军队不够巩固、地方党与军队党团结不力等现象。基于武装对坚持抗战的重要性，中共在已有工作基础上从各个方面不断强化对军队的领导，太行根据地党军关系由此焕然一新。

作为一种区别于以往统军制度的新变革，党军制度由落地生根而日趋成熟，显示了中共非凡的政治智慧。不过，中共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并非一蹴而就，中间经过了不断摸索与巩固的过程。在总结以往建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抗战新形势，毛泽东明确提出“党指挥枪”的论断，进一步夯实了中共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设计。继之，以持续发力的党的建设和政治训练巩固党组织（中共中央、军队党与地方党），同时协调地方党与军队关系，使军队成为中共领导下卫护根据地建设的屏障。当然，在抗战时期

^① 田 X：《本人简历》（1941 年），《关于一二九师人事、组织材料》，河北省涉县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 1-2-34。

^② 陈 XX：《本人履经过》（1941 年），《关于一二九师人事、组织材料》，河北省涉县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 1-2-34。

^③ 平顺县委：《关于参军的紧急再指示》（1945 年），山西省平顺县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 39-2-75-7。

中共特殊的“央地”关系下，出于防止滋生地方诸侯，牢牢控制军队亦是中共中央对地方根据地一元化领导和管理的核心方式。由此，党军关系的协调是根据地建立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的关键一环。

伴随着抗战初期党组织大规模扩容，中共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性政党，进而赋予党领导的军队以“群众性”，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他们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①军队完全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党军成为人民子弟兵，坚决维护人民利益，军队在人民之中有了深厚根基，党政军民结合为一体，敌后持久战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有强大的党，有久经锻炼的党中央经常恰如其时摆动胜利之舵，保证在任何情形之下，向胜利前进。”（山西省档案馆，1994a：230）相较之下，国民党军队并未成为有主义有纪律的军队，其敌后抗战基本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缺乏党政民配合和根据地建设，生存能力远远不如中共。^②可见，国共敌后抗战的不同态势彰显出两党不同的政治理念。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993：789）即有了以人民利益为旨向的军队就有了人民的一切，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博弈或许在此时已初见分晓。

参考文献

- 曹子洋（2017）：《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党对党军关系的认识与实践》（《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第115-122页）。
- 陈永发（1984）：《从 Ralph Thaxton 的研究论抗日时期中共在太行山区及其附近的活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第333-386页。
- 陈永发（1998）：《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何友良（2017）：《八一南昌起义与中共党军关系的演进》（《军事历史研究》第3期，第1-10页）。
- 黄道炫（2015）：《中共持久抗战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第4-22页。
- 黄道炫（2017）：《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第4-22页。
- 军事科学院《谭政军事文选》编辑组（2006）：《谭政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 李金铮（2016）：《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第10-14页。
- 李翔（2016）：《革命的播种者：1924年黄埔军校的政工群体》。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李月军（2013）：《“党军共生”背景下的多重实践——1927-1934年中共的军队政治工作与党军关系》，《军事政治学研究》第1期，第1-27页。
- 秦基伟（2013）：《本色：秦基伟战争日记》上。北京：新华出版社。
- 毛泽东（1991a）：《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①《康泽呈蒋中正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联络参谋李德三至六月工作报告》（1938年8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档号002-020300-00049-020。

^②学界对国民党敌后抗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台湾学者陈永发承认敌后国民党军队很难与日军周旋，经常遭受歼灭性打击，甚至不能立足。参见陈永发（1984）、（1998：1998：337-338、351-352）；。大陆学者黄道炫的研究亦体现了这一点。参见黄道炫（2015）、（2017）、。

毛泽东（1991b）：《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1c）：《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山西省档案馆（1989a）：《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省档案馆（1989b）：《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省档案馆（1994a）：《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省档案馆（1994b）：《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省档案馆（2000a）：《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省档案馆（2000b）：《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任伟（2018）：《苏区时期红军与地方关系探微》，《史林》第3期，172-184页。

[日]田中仁（2009）：《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军关系初探——中共党史研究的再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第306-31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89）：《党的建设》。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王奇生（2010）：《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

岳谦厚（2018）：《太行山和吕梁山中共抗日根据地文献整理与研究述评》，《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第4期，第94-102页。

岳思平（2017）：《八路军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1986）：《太行抗日根据地》一。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9）：《中央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99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刘少奇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997）：《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1a）：《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1b）：《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1c）：《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1d）：《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2011e）：《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山西省和顺县委组织部等（1995）：《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和顺县组织史资料》。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山西省沁源县委组织部等（1992）：《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沁源县组织史资料》。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山西省襄垣县委组织部等（1992）：《中国共产党山西省襄垣县组织史资料》。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99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时间不详 a）：《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北京：内部印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时间不详 b）：《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北京：内部印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1）：《八路军·回忆史料》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4）：《八路军·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19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1991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1991b）：《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1991c）：《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1991d）：《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朱德（1943）：《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解放日报》4月16日，第4版。

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华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农村支部研究》（项目编号21AZS013）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瑞峰，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发表有关太行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专题学术论文多篇，参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

岳谦厚，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山西大学“山西省‘三晋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二级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及中共革命史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以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研究》《边区的革命（1937~1949）——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社会史论》《女性·婚姻与革命——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女性婚姻问题研究》《从集体化到“集体化”——1949年以来郝庄的经济社会变革之路》等。